

開啟宗教對話的大門

——從「梵二之父」若望二十三世談起

段春生

導言

眾所周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Saint John XXIII, 1881-1963, 1958-1963 任教宗職）是一位廣為大家喜愛的「人民的教宗」與「好牧人」。他在任期間最大的手筆，就是在梵蒂岡成功的召開了天主教第二十一屆大公會議。1963 年，若望教宗撰寫的《和平於世》（*Pacem in Terris*）更是第一部同時向天主教信徒和「一切善意人士」而發的教宗通諭，為梵二大公會議的召開指明了方向。若望二十三世使教會搭上了開往現代化的列車，被譽為「梵二之父」。

在梵二開幕詞中，聖教宗明確指出教會要與時俱進（*Aggiornamento della Chiesa*），由此，開啟了教會與世界，與其它宗教對話的大門。這扇洞開的對話大門，不僅為不同基督徒團體，也為整個近現代世界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由若望二十三世開啟的對話之路，在其後的幾任教宗：保祿六世（Paul VI, 1963-1978）、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 1978-2005）、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2005-2013）以及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 2013-）身上得到不斷地發揚和廣大，產生了一系列破冰的奇效，給教會發展開創了新的格局。

壹、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其人

一、童年與修院培育

安傑羅·朱塞佩·龍嘉利（Angelo Giuseppe Rongalli）¹ 於 1881 年 11 月 25 日，出生於意大利倫巴第大區名叫索伊爾蒙特的小村莊。他出生的當天晚上，就由本堂神父方濟·雷布齊尼（Francesco Rebuzzini）受洗，聖名安傑羅·若瑟（Angelo Giuseppe）。安哲羅的父母是非常虔誠而樸實的基督徒。這個熱心的「家庭教會」成為他信仰成長的搖籃，對他一生的信仰影響很大。²

1892 年 11 月 7 日，安哲羅進入貝爾加莫修院（Bergamo's Seminary）。1901 年，被送往羅馬阿波利奈爾（Apollinare）修院學習。1904 年 7 月 13 日，獲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並於同年 8 月 10 日在羅馬晉鐸。1905 年 2 月，他被任命為貝爾加莫新任主教賈科莫·拉迪尼·特德斯奇（Giacomo Radini Tedeschi）的秘書長。³

值得注意的是，自 1906 年起，安傑羅神父在貝爾加莫修院教授教會史、教父學和護教學。據載，他「對文學和歷史皆極有研究。特別是貝爾加莫省的史蹟，更是熟悉，如數家珍」。⁴ 由於對教會歷史研究抱有極大的興趣，在此期間，他出版了一系列關於

1 天主教傳統中的 Angelo 通常譯為是天使，Giuseppe 是若瑟。鑑於學界對西文名字多採用音譯的方法，故本文採用學界慣用譯法，Angelo：安哲羅，Giuseppe：朱塞佩，Rongalli：龍嘉利。

2 Bill Huebsch（許布施），《若望二十三世的靈修智慧》（*The Spiritual Wisdom of Saint John XXIII, Powerful Insights, Simple Practices, Heartfelt Prayers*）。

3 Mario Benigni-Goffredo Zanchi, *John XXIII, The Official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Elvira DiFabio, Books Media, Boston, 2001, pp. 23-25。

4 張秀亞，《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台灣：聞道出版社，2014），頁 66。

貝爾加莫地方教會的歷史著作。⁵ 譬如，他的《聖嘉祿·鮑榮茂使徒訪問貝加莫傳（1575年）》專著，此書共有五卷，於1936年至1952年陸續出版，這項長達近二十年的研究工作，直到他當選教宗前才全部完成。⁶

二、卓越的教廷大使

1920年12月，他被任命為「義大利宗座傳信部」主席，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此後，1925年3月19日，他在羅馬祝聖為主教，出使保加利亞。他促進當地天主教與政府建立了友好關係，並與保加利亞東正教展開了嘗試性的接觸和對話。1934年11月27日，他被任命為土耳其和希臘的宗座代表。⁷

龍嘉利主教具有明智和處理棘手問題的能力，能在錯綜複雜的事務中迅速地理清問題的癥結，直奔問題的核心予以化解。1944年底護十二世（Pius PP. XII, 1939-1958）慧眼識人，任命他為聖座駐法國大使，把當時最棘手問題交給他。龍嘉利主教以特有的「平靜、溫和與敏銳」，把法國政教衝突帶給教會的損失減少到了最低程度。他的才華贏得了巴黎各界的認同與讚賞。龍嘉

5 *Il cardinale Cesare Baronio. Nel terzo centenario della sua morte*, in *La Scuola Cattolica* a. 36, s. 4, v. 12, gennaio 1908; *Note storiche intorno al santuario di S. Maria della Castagna presso Fontana (Bergamo)*, Bergamo, Istituto italiano d'arti grafiche, 1910; *La Misericordia Maggiore di Bergamo e le altre istituzioni di beneficenza amministrate dalla Congregazione di Carità*, Bergamo, Tipografia S. Alessandro, 1912; *In memoria di mons. Giacomo Maria Radini Tedeschi vescovo di Bergamo*, Bergamo, S. Alessandro, 1916.

6 *Gli atti della visita apostolica di S. Carlo Borromeo a Bergamo (1575)*, a cura di, con la collaborazione di Pietro Forno, Firenze, Olschki, 1936-1957.

7 畢爾麥爾（Bihlmeyer）等編著、雷立伯（L. Leeb）譯，《近代教會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頁378。

利擔任法國大使長達九年之久，這些經驗對他日後召開梵二大公會議具有很大的幫助。⁸

三、教會的「好牧人」

1953 年龍嘉利被擢升為樞機，任威尼斯的總主教（patriarcha）。消息傳到了法國，整個朝野都為之慶賀，法國人稱讚他是「忠實誠篤、愛好和平的教士」。⁹ 在威尼斯期間，他廣泛與各界人士進行對話，認真聽取不同意見，及時表達了對所需之人的同情與關切；因其機智風趣，態度和藹，言語詼諧，深受眾人的熱烈擁戴。¹⁰

1958 年 10 月 28 日，龍嘉利樞機當選為教宗，取名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成為第 261 位教宗。在任期間，他最大的手筆是成功召開了梵二大公會議，促進教會內部的自我更新，推動不同基督徒之間的對話與合一。1963 年，梵二休會期間，年逾八旬的若望二十三世自知在塵世的日子不多，他殫精竭慮、嘔心瀝血，親自起草了《和平於世》（*Pacem in terris*）通諭，為梵二會議與教會未來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1963 年春季，因他對教會和社會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被授予「巴爾贊」和平獎。1963 年 6 月 3 日，他完成了天主交給自己的使命，安息主懷，享年八十有二。¹¹

貳、梵二大會的偉大設計師

8 畢爾麥爾，《近代教會史》，頁 378。

9 張秀亞，《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頁 45。

10 同上書，頁 47。

11 參閱，畢爾麥爾，《近代教會史》，頁 425。

一、梵二前的教會掠影

十六世紀中葉，面對新教改革帶來的強大衝擊力，教會於1545-1563年召開了特利騰大公會議。該會議一方面針對新教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動和強化了教會內部的革新，由是形成了現代天主教的特徵。¹² 十七至十九世紀，教宗的權威受到了高盧主義（Gallicanism）、費布羅尼厄斯主義（Febronianism）和約瑟夫主義（Josephism）的挑戰。¹³

十九世紀末，教宗庇護九世（Pope Pius IX, 1792-1878）主持召開了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1869年12月8日-1870年7月18日），該會強調了「教宗的首席權」，並宣布了「教宗無謬論（infallibilitas）」的教條。¹⁴ 因普法戰爭的爆發與意大利部隊佔領羅馬，致使庇護九世於1870年10月20日宣布中止大會。¹⁵

之後，為抵禦各種世俗主義的衝擊，維護教會傳統的價值，庇護十世（Sanctus Pius PP. X, 1903-1914）於1907年7月3日在《怨天尤人》（*Lamentabili sane exitu*）訓令中，提出一個新的《提要》（*Syllabus*）集中而系統地譴責「現代主義」的思想體系。¹⁶

12 畢爾麥爾，《近代教會史》，頁73。

13 岡薩雷斯著、陳澤民等譯，《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冊），（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頁418-419。

14 畢爾麥爾，《近代教會史》，頁295-296。

15 陳文裕，《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史》，（台北：上智出版社，1997），頁20；卓新平，《當代西方天主教神學》，（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90-91。

16 畢爾麥爾，《近代教會史》，頁346；岡薩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冊），頁418-419。

自 1903 至 1958 年間，以「庇護」（Pius）命名的庇護十世、庇護十一世（Pius PP. XI, 1922-1939）與庇護十二世，因維護傳統教會神學思想，均被批評為「神學保守主義」。¹⁷

廿世紀上半葉，湧現出一批以耶穌會士與道明會士為主流的傑出的神學家，其著作在五十年代，被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廣泛閱讀，但他們的神學思想均遭到官方教會的譴責。¹⁸ 其中，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 1881-1955）去世十年後，他的著作「成為開始發現他的許多哲學家 and 神學家的領路人」。卡爾·拉內（Karl Rahner, S.J., 1904-1984）因對傳統「神學的每一個主題都檢討過、討論過，重新解釋，並重新使之有活力」，被譽為「天主教神學偉大教師」。¹⁹

上述神學家的思想在梵二會議上被得到尊重和接納，他們成為梵二重要的神學家，為該屆大會提供了豐富的神學資源。

二、「讓新鮮的空氣進來吧」

自 1870 年 10 月 20 日梵一會議宣告中止以來，繼任的教宗們都想嘗試完成梵一會議。1923 年 10 月 22 日，庇護十一世即曾寄發公函，徵求全體樞機、總主教及主教們的意見。可惜後來由於其它重要問題，因此而擱淺。庇護十二世也曾有意召開大公會

17 岡薩雷斯著、趙城藝譯，《基督教史》（下卷），（上海三聯書店，2010），頁 499。

18 如德日進、呂巴尼（Henri-Marie de Lubac, S.J., 1896-1991）、孔格（Yves M.-J. Congar, O.P., 1904-1995）、舍尼（Marie-Dominique Chenu, O.P., 1895-1990）、拉內、朗尼根（Bernard Lonergan, S.J., 1904-1984）等。參閱，岡薩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冊），頁 501。

19 同上書。

議，並以很嚴密的方式在聖職部進行，甚至於 1949 年成立籌備委員會，可惜年邁的教宗最終因精力不濟懷抱遺憾而放棄。²⁰

1958 年 10 月 28 日，龍嘉利樞機當選為教宗。當他被選出來的時候，人們認為這位老人只是一個「過渡的教宗」。然而，這位出身平凡、年屆 77 歲的老教宗，很快便展露了他的「閱歷深厚的人性與司鐸的特質」。他的一系列的舉措，讓教廷的官員和衛隊感到擔憂，因為他史無前例地訪問了羅馬附近的貧困地區，探訪監獄的囚犯，看望醫院裡的病人。事實上，他經驗豐富，智慧超群，在保加利亞、伊斯坦布爾和法國解決棘手問題的能力向世人表明，他懂得如何談判和處理錯綜複雜的外交事務。在擔任大使的生涯中，讓他深入了解到天主教已經脫離了現代世界。²¹

在他擔任威尼斯總主教時，就已萌生了召開大公會議的念頭，只可惜他不在其位，而「常以為不能越俎代庖，做分外之想」而感嘆。當選教宗後第三天，在他與陸費尼樞機（Ernesto Ruffini, 1888-1967）談話時首次提到「大公會議」的字眼。1959 年 1 月 20 日，他接見國務卿戴地尼（Domenico Tardini, 1888-1961）樞機時，提出要召開大公會議，以革新教會，他的提議立刻得到了國務卿的贊同和支持。²²

1959 年 1 月 25 日，聖保祿宗徒瞻禮彌撒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羅馬聖保祿大殿隆重宣布要召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當時，羅馬教廷有很多人支持，但也有些人不贊成，他們認為以往召開大公會議是為了應付異端的威脅；也有人以為要召開的大公會，可能是繼續梵一沒有結束的會議。但大家沒有想到，若望

20 參閱，陳文裕，《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史》，頁 35-36。

21 參閱，岡薩雷斯，《基督教史》（下卷），頁 443。

22 參閱，陳文裕，《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史》，頁 35-36。

二十三世肩負着巨大的歷史使命，他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要為沉悶、僵硬的教會帶來新鮮的空氣。在面對一些人質疑是否有必要召開大公會議時，若望二十三世推開窗子說：「讓新鮮的空氣進來吧」。²³

三、梵二大會召開

1962 年 10 月 11 日，天主教第二十一屆大公會議在梵蒂岡隆重召開。作為一位先知性的直覺者，若望二十三世在致開幕詞的演講中，真誠地跟世人分享了當初召開大公會議的想法是如何產生的，他說：「為了歷史記錄，讓我告訴你們，大公會議的念頭如何進入我的思想，大公會議這個字眼首次來到我的唇邊，是在 1959 年 1 月 25 日，在聖保祿的瞻禮，在奉獻給他的座堂，在教會主教的當中，這想法來的出奇不意，好像天上來的閃爍」。²⁴

接著，教宗為梵二大會指出明確的目標：其一，是「更新教會（Aggiornamento della Chiesa）」；其二，是「牧靈性」的會議。²⁵

顯而易見，作為梵二設計師的若望二十三世，指示教會不僅要適應社會的外在生活，而且也要推動在思想方面的內在更新，就是要擺脫特利騰大公會議以來的嚴格的律法模式，從而走向對社會的關懷，走向與各個宗教的對話和交談；並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對天主子民的牧靈關懷。毫無疑惑，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是要建立一個與時俱進的天主教會。²⁶

23 同上書。

24 同上書。

25 同上書，頁 217。

26 布魯斯·雪萊著、劉平譯，《基督教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512。

1962年10月11日，歷史給我們記載下百年盛會的一幕。參與梵二大會的有來自全球的2540位樞機主教、宗主教、主教，以及幾千位來自全球的觀察員、神學家和客人²⁷：

「八時三十分，主教們的遊行隊伍跨出教宗宮廷的銅門進入伯鐸廣場。他們五人一列，一律穿著白色大披肩，白色高冠，濟濟在黑色的人群中形成一條銀河。他們走到廣場正中，繞一直角，朝向伯鐸大殿前進。主教們後面是教宗乘肩椅出現，一路舉手降福群眾」。²⁸

很明顯，該屆大會與以往任何一屆大會都迥然不同，僅從參加人數就可看出大會的普世性特點。若望二十三世旗幟鮮明地肯定了梵二是「牧靈性質」，而非「討論教義」的會議。教宗認為「梵二不是號召反對某些東西，而是要贊成某些東西」，教會應該「用慈悲的良藥」，而非用俗世的武器維護其權威。因此，梵二是教會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譴責任何思想或主義，沒有宣布新的教條的會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希望基督徒能在當下社會處境下活出福音的精神。²⁹

四、捍衛真理與美善的「好牧人」

聖教宗自所以有如此博大的胸懷，推動分離的基督徒對話以走向合一的道路，是源於他的熱心祈禱，在他看來「祈禱常被稱為天人的對話」，「在祈禱中我們就是被天主說出來的話，祈禱就是我們進入我們的生命，一如神聖進入它的根源，一如神聖進

²⁷ 畢爾麥爾，《近代教會史》，頁425。

²⁸ 陳文裕，《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史》，頁36。

²⁹ 雪萊，《基督教會史》，頁512-513。

入它的終向」。³⁰ 若望二十三世豐富的祈禱生活成為他與不同人士對話的靈修資源和力量。

據載，當他在土耳其任宗座大使的時候，一天黃昏，他到一座教堂去視察，當他聽到教友用法文祈禱時，便詢問緣故，在得知教友一直以來都是用法文祈禱時，他不禁問難道「他們都是法國人嗎？」「不，都是土耳其人。」「那麼譯成土耳其語不更好嗎？」於是，第二天該堂的教友們便完全用土耳其語祈禱了。他在土耳其十年的大使生涯，給當地人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³¹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每到一地，都「重視會見、結交非天主教人士」。在土耳其時，「他曾幫助營救逃出納粹德國的猶太人，給他們提供物資援助」。在戰後的法國，當他看到紀錄片中布亨瓦爾德和奧斯維辛堆積如山的猶太人的屍體時，他驚呼：「怎麼會發生這一切？他們都是基督的奧體啊！」被選為教宗之後，當猶太人來梵蒂岡拜訪，他熱情地走過去，握住他們的手，不斷重複舊約聖經裡的話：「我是若瑟，你們的兄弟」。³²

1950 年，著名神學家孔格出版了他的大作《教會內的真假改革》（*True and False Reform in the Church*）一書，時任教廷駐法國大使的龍嘉利宗主教閱讀了該書後，深深被此書的「聚焦於教會的革新和聖德、教會的傳統、平信徒的參與，以及洞察出教會是天主的子民」的深邃的思想所打動，後來在籌備梵二準備工作時，若望二十三世特邀孔格參與梵二的籌備工作。³³

30 許布施，《若望二十三世的靈修智慧》，頁 44。

31 張秀亞，《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日》，（台南：聞道出版社，2014），頁 36。

32 雪萊，《基督教會史》，頁 511-512。

33 傑姆·克羅格著（James H. Kroeger, MM）、劉德松譯，《梵二開啟的旅程》（*A Vatican II Journey: Firty Milestones*），（台北：光啟出版社），頁 66-67。

叁、若望二十三世到方濟各的對話之路

1961年的聖誕節，梵二籌備委員正式邀請了2500名代表人物來參與梵二大會。³⁴事實上，普世基督新教協會和新教的一些大的教派都派了觀察員出席了這屆影響歷史、盛況空前的大公會議。在大會開幕的第二天，「莫斯科的宗主教所派遣的兩位觀察員也抵達了羅馬，……給大會平添了很大的喜慶」。除了希臘，其他東方教會團體均派遣了觀察員與會。³⁵

若望二十三世鼓勵大家應以仁慈和對話為先，而非以譴責和對抗的思維相處。事實上，新教與東正教的代表們也以正面的眼光看待大公會議，給予大會很大的希望。³⁶

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彼此充滿了「敵意與防衛」，雙方忘記了所擁有的共同信仰，而只注意到彼此之間的區別。梵二則通過合一運動的《大公主義法令》催促基督徒開放自己，讓他們意識到對於分裂教會「雙方都難辭其咎」。而走向真正的合一，要求既要忠於自己的信仰，又要欣賞和接納其他基督徒團體的真實價值。³⁷

此外，《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鼓勵基督徒展開與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信徒進行宗教交談，以維護「在那些宗教徒間所發現的精神與道德的美好事物，以及社會文化的

34 畢爾麥爾，《近代教會史》，頁378。

35 雪萊，《基督教會史》，頁314。

36 同上書，頁66-67。

37 傑姆·克羅格，《梵二開啟的旅程》，頁79。

價值」。這種促進宗教間的相互尊重與了解，被稱為「宗教交談」。³⁸

由若望二十三世開啟的對話之路，在教宗保祿六世、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以及方濟各（Pope Francis, 2013-）身上得到繼承和發揚，並產生了破冰的效果。

一、保祿六世千年破冰

在梵二會議召開期間，有兩件大事頗具「千年破冰」的歷史意義：分別是教宗保祿六世去耶路撒冷朝聖與大公會議閉幕前夕，東正教與天主教同時宣布撤銷，自 1054 年以來的絕罰令。

千年破冰的行動最早始於龍嘉利主教。1934 年 11 月 27 日，他被任命為土耳其和希臘的宗座代表。在他的努力下，教會不僅與土耳其政府的關係得到改善，也與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正式會晤，這是自 1054 年東西方教會分裂後的首次接觸。³⁹

1964 年 1 月 4 日至 6 日，教宗保祿六世赴聖地朝聖。他是自教宗庇護七世（Pope Pius VII, 1775-1799）於 1798 年被俘虜後第一個離開梵蒂岡的教宗，也是教會歷史上第一位到耶路撒冷朝聖的教宗。這是一次尋根之旅，也是一個大公合一的舉動。保祿六世與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領袖阿忒那戈拉（Athenagoras）宗主教，在耶路撒冷進行了歷史性的會晤。保祿六世向這位東正教母牧首表達的第一句話是，「我實在認為這是我們活在天主臨在中

38 同上書，頁 81。

39 穆啟蒙著、侯景文、陳白希譯，《天主教史》（卷四），（台北：光啟出版社，1987），頁 314-316；韋爾著（Timothy Ware）、田原譯，《東正教會導論》，（香港：道風書社，2013），312-31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4237e0102elq1.html（2017 年 10 月 24 日）。

的時刻」。宗主教也表達他「深受感動，熱淚盈眶」，並且表示信賴這位天主教首領。他說：「天主聖意的安排選擇陛下開啟祂的道路……世世代代都期待著這一天，這重大日子」。⁴⁰

1965年12月7日，梵二大公會議閉幕前夕，天主教與東正教在和解的路上邁進了一大步：「雙方聯合聲明同意取消1054年造成東方和西方教會決定性分裂的絕罰令」，承諾彼此不再相互斥為異端。保祿六世派一個代表團赴君士坦丁堡，在奈德納宗主教和議會前宣讀了共同聲明；同時，東正教以梅里東為首的一個代表團，在伯多祿大殿參加了教宗與二十一位樞機舉行的彌撒，宣讀了同樣的聲明。⁴¹

雙方承認：

「這是互相體諒的誠懇表示，並共同邀請，在彼此信任尊重和互相的友愛下，彼此進行商談，以期賴天主的助佑導致雙方，在信德和友愛的完美共融中生活，那本是東西教會在他們歷史的最初千年中早已存在的現象」。

⁴²

之後天主教教宗與君士坦丁堡首牧也保持正常來往，雖然還沒有達到完全共融，但東西方教會千年對峙的冰凍格局自此宣告結束。

二、若望保祿二世與中國的對話

40 同上書。

41 穆啟蒙，《天主教史》（卷四），頁316-317；韋爾，《東正教會導論》，頁313；畢爾麥爾，《近代教會史》，頁421-422，425。

42 穆啟蒙，《天主教史》（卷四），頁317。

秉承若望二十三世的對話精神，若望保祿二世於 1981 年 2 月 18 日，在馬尼拉進行牧民訪問講話時，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和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親切的問候：

「我，若望保祿二世、羅馬主教、伯多祿的繼承人，在吾主耶穌基督的名下，向中國親愛的兄弟姐妹致意。……我同時希望透過我卑微的語言，向你們偉大的國家致敬。貴國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不僅地大人眾，而且歷史悠久、文化深厚、道德崇高，這是人民數千年來耕耘的結果。耶穌會會士利瑪竇神父從一開始就認識和欽佩中國文化，他可說是大眾的榜樣。」⁴³

1982 年 9 月 10 日，若望保祿二世在致信慶祝「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之際，再一次由衷肯定了利瑪竇開啟了中西方文化對話的大門，他說：

「東西文化既如此差距，利神父早已知道該如何使兩者溝通，而他作為中介橋樑的精神和方法，亦已為梵二所確認，因為梵二聲明，我們應該努力熟悉地方的風俗及宗教傳統，應該以欣然起敬的態度，去發掘蘊藏這些事物中的聖道的種子」。⁴⁴

若望保祿二世相信埋葬在北京柵欄墓園的利瑪竇就是那個「聖道的種子」，他稱讚利氏走在了時代之先，梵二也肯定了利氏的傳教方針。

教宗相信中國天主教教友會秉承利瑪竇的精神，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和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43 「真正的基督徒，亦是真正的中國人」（1981 年 2 月 18 日），見蘇主榮編輯，《牧我中華》，（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6），頁 153-154。

44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致瑪薩拉達城主教書」（1982 年 9 月 10 日），見蘇主榮編輯，《牧我中華》，頁 174。

「……我深信貴國每一位天主教徒一定會為中國的建設作出貢獻，因為真正而虔誠的基督徒——忠信天主，但也具有深厚的責任感——愛國愛民。他重視精神生活，也樂意為大眾利益貢獻所長。良好的中國天主教徒，定必為國家的進步效勞，履行對父母、家庭和國家的職責。藉著福音的力量，他像其他所有良善的中國人民一樣，培育「五德」——仁、義、禮、智、信」。⁴⁵

若望保祿二世殷切希望中國天主教徒能將基督的福音與傳統儒家的「五德」有機結合起來，活出「真正的基督徒，亦是真正的中國人」。

1994年11月10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東方亞述教會首牧瑪爾定四世（Mar Dinkha IV，1935-2015）在梵蒂岡簽署的《在天主教會與東方亞述教會之間共同基督論聲明》，稱聖母為「我們的天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母親，根據同一信仰天主教傳統，尊頌貞女瑪利亞為天主之母，同時也為基督之母」。⁴⁶

這份共同聲明，對中國天主教至關重要，至少可以證明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傳入中國的景教（Nestorian）不是異端。因為，明末在華耶穌會士被維護中國道統的士人所詬病，他們認為天主教是一個新興的宗教。而1625年於西安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則證實早在公元635年，天主教的一個支派已經傳入中國。這一事件，讓在華傳教士欣喜異常。因此之故，明末天

45 「真正的基督徒，亦是真正的中國人」（1981年2月18日），見蘇主榮編輯，《牧我中華》，頁153-154。

46 安才譯，《天主教會與東方敘利亞教會握手言和，1500年的宿案終於和解》，見上海教區光啟社《海外天主教動態資料》，1995年第4期。

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等，均曾以「景教徒」來自稱。以此證明天主教傳入中國由來已久。⁴⁷

此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2000 年 10 月 1 日，為中國教會宣聖 120 位真福。這為中國教會來說是無上的榮耀。

三、本篤十六世與中國的對話

2005 年 4 月 19 日，年屆 78 歲的拉辛格樞機被選為教宗，他當選時比若望二十三世選為教宗時還要年長一歲。他為推動與中國的對話，於 2006 年 2 月 22 日，任命陳日君主教為第六位華人樞機主教。

2007 年 6 月 30 日，本篤教宗親自為中國天主教書寫牧函，在牧函中他深情流露出對中國人民的崇敬和熱愛，以及對中國教會的關注和愛護。

2008 年 5 月 24 日，教宗將每年的 5 月 24 日定為「世界為中國教會祈禱日」，可謂空前未有。接著，教宗還親自為撰寫了「佘山聖母頌」，表達了對中國教會的殷殷關愛之情。

47 1632 年徐光啟為韓霖與韓雲寫的〈景教堂碑記〉，參見，李天剛編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箋注——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論教文集》，（香港：道風書社，2007 年），頁 70-73。此外，以景教後學自稱的明末基督徒：王徵與鄧玉函撰《奇器圖說》，署名「關西景教後學」；山西絳州朱鼎瀚在為利瑪竇《西國記法》再版時自稱「東雍景教後學朱鼎瀚」；林一攜與李九標為艾儒略的《聖夢歌》做小引和跋，亦署名「景教後學」；利類思譯的《超性學要》，卷首有「景教後學林騶署箋」。此外，如韓氏兄弟、段氏兄弟、朱宗元等明末天主教徒都常以景教碑為榮，以景教徒自稱，爭當「景門後學」。參見拙文，段春生，〈徐光啟與高一志及其門生韓雲、韓霖〉，見《神學研究》，（北京：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神學研究委員會，2015 年第一期，總第 35 期），頁 45-58；Duan Chunsheng, "Un cristiano alla corte dei Ming, Xu Guangqi e il dialogo interculturale tra Cina e Occidente", (Guerini e Associati, Milano, 2013), pp. 189-202.

2010年12月，擢升韓大輝為總主教，任萬民福音傳播部秘書長，並於2011年2月5日親自舉行祝聖禮儀。

本篤十六世又於2012年1月6日宣佈擢升湯漢為樞機，使其成為華人第七位樞機主教；成為羅馬天主教樞機院成員，中國問題專家成員，為進一步推動與中國對話的進程。

鑑於，本篤教宗為中國教會所作的一系列的舉措，影響深遠、意義非凡。如將本篤十六世與因關愛和支持中國教會而享有「中國的教宗庇護十一世」相媲美，實不為過。

四、與中國對話中的教宗方濟各

方濟各教宗（Pope Francis, S.J., 2013-）自當選之初，便「以簡化繁文縟節，強調人情、簡樸和特別關注無信仰者的風格，立刻博得舉世的敬仰」。⁴⁸ 這位來自南美洲的教宗與若望二十三世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二人都是在七十七歲高齡當選教宗，在世人看來，他們好像是過渡的教宗，事實上，他們雖在晚年卻有驚人的手筆，以雷霆萬鈞之力推動教會內部的革新和教會與不同宗教間的對話。

1. 五百年的破冰行動

教宗方濟各於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訪問瑞典，參加了由天主教與信義會共同舉行的「宗教改革500週年紀念活動」。這是雙方「共同尋求和解及合一行程上的里程碑」。

這次共同紀念活動乃是梵二大公會議召開五十年來促進對話的成果，是遵循聖若望二十三世早已闡明的對話原則：「使我們

⁴⁸ 安德烈·托爾涅利著、江國雄譯，《教宗方濟各》，（台南：聞道出版社，2013）。

合而為一的事遠大於分裂我們的事」。⁴⁹ 由於成義教義是引發爭論的一個中心主題，因而對話抵達的一個高峰就是 1999 年簽署的《關於成義教義的共同聲明》。聲明的中文版，經香港天主教與信義宗共同努力於 2017 年出版，標誌著宗教對話將在華人教會發揮重要的影響。

在紀念活動中，教宗方濟各與信義宗領袖在瑞典南部隆德大教堂，共同主持了合一祈禱會。在大會上，教宗呼籲天主教徒和信義宗會友應「修補」歷史，誠實看待過去，並「承認錯誤和尋求寬恕」。我們必公開承認，我們都在基督面前犯了錯，破壞了教會的合一。⁵⁰

教宗感嘆道，在聖座機構的促成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起討論路德：我們實在親身體驗到了聖神的果實。聖神的行動越過各種藩籬，將衝突轉化為增進共融的時機。

信義會和天主教會委員會在紀念路德開啟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的機會上，共同發表了一份題為「從衝突到共融」的文件。教宗藉此表示，這項紀念活動讓我們有機會一起思考當時所發生的事件，因為認真深入探討路德這個人，以及他對當時教會和教宗牧職的批評，必能幫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克服過往許久以來的互不信任和敵對情緒。

教宗解釋說：

「嚴肅認真，不局限於思想意識的偏見和爭論，這樣的研討能幫助今日處於對話中的教會分辨並接受在宗教改革中的積極與合理因素，遠離錯誤、誇張和失敗，承認

49 龔聖美譯，《從衝突到共融：2017 年信義宗——天主教共同紀念改革運動合一中譯本》，（香港：道風出版社，2017），頁 6。

50 傑姆·克羅格，《從衝突到共融》，頁 6。

那些導致分裂的罪過。我們眾人都清楚意識到，過去已無可挽回。但今天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開啟大公對話的五十年後，我們能完成一次記憶的淨化，不再因彼此受到的傷害而懷有怨恨」。⁵¹

教宗最後表示，我們全體基督徒都蒙召摒棄偏見，不評斷別人以不同視角和言詞所持的信仰，卻應為我們先人鑄成的過錯彼此寬恕，一起向天主呼求修和與合一的恩典。

2. 走在與中國對話的路上

身為耶穌會士的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 1936-）很早就得知在華耶穌會士利瑪竇的《交友論》，是「以友愛來為福音作證」。因此，當選為教宗之初，就頗為關注與中國的對話，且多次表達「他想去訪問中國和探訪中國的教會」。⁵²

教宗提到了公元十六世紀前往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特別指出利瑪竇強調了同中國對話的必要性。他說，羅馬天主教會的一個責任就是尊重所有的文明，在中國文明面前，天主教會必須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一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方濟各在2016年中國新年來臨之際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向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全體中國人民致以春節的問候，他讚揚中國「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國家，還是一個偉大的文化，有著無窮盡的智慧」。他希望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失去自己作為一個偉大的人民，擁有偉大智慧歷史，而且能為世界做出巨大貢獻的歷史意識」。

51 ht.radiovaticana.va/news/2017/03/31（2017年10月24日星期二）。

52 安德烈·托爾涅利著、江國雄譯，《教宗方濟各》，（台南：聞道出版社，2013），頁vii。

方濟各接受訪問時表示，梵中關係良好，他希望可以訪中國。但他也表示，中國有地上教會和地下教會。梵蒂岡與中國的工作組正在商討中梵關係，「我們正在研究和對話」。教宗方濟各指出當下梵蒂岡與中國正處在對話的道路上。

結語

梵二之父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出身於一個具有虔誠基督信仰的貧民之家，特有的生活背景使其擁有悲天憫人的情懷。龍嘉利神父在貝爾加莫修院教學期間對地方教會史的精湛研究，使他不僅獲得地方史的豐富的學術涵養，還使他具備了全球教會史的寬廣視野。在長期擔任教廷大使期間，他敏銳地洞察到了教會已經與時代相脫節，且遠遠落後於時代。因此，在他當選教宗三個月後，就強烈呼籲召開大公會議，並以雷霆萬鈞之勢推動教會內部的自我更新。

他主持召開的梵二大會，正是藉著教會的自我更新，要讓教會成為天主慈悲的面容，以表達對世界的關懷，推動與不同基督徒，不同宗教團體的開放性的對話。

梵二大公會議召開時，由於特殊原因，大陸的主教未能參加。當時代表中國教會參加會議的共有五十七位主教，其中有十位中國主教：即田耕莘樞機、于斌總主教、郭若石總主教、羅光、杜賓晉、鄭天祥、牛會卿、成世光、張維篤與袁慶平諸位主教，其他的是那些曾在大陸傳教，後被遣返回國的外籍主教。⁵³

53 穆啟蒙編著、侯景文譯，《中國天主教》，（台北：光啟出版社，1971），頁 181。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與會期間多方接觸中國主教，有機會了解了中國教會的實際情況，並對中國教會表達了慈父的關懷。

由若望二十三世開啟的對話之路，經由教宗保祿六世接過了接力棒，在他的努力下大公會議沿著梵二的設計師 —— 若望二十三的精神繼續召開，並在達到了既定目標後，於 1965 年 12 月 8 日圓滿閉幕。保祿六世的對話之路帶來了千年破冰的奇效：1965 年 12 月 7 日，天主教與東正教同時宣布撤銷了自 1054 年彼此的絕罰令。

若望保祿二世由前任教宗接過了對話之路的接力棒，繼續走在與世界，特別是與中國的對話之路上。他多次表達了對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的敬仰，對中國傳教先驅利瑪竇神父的欣賞。他深信當下的中國天主教徒，也一定能像利瑪竇那樣，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也是真正的中國人。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親密的合作者與繼任者 —— 教宗本篤十六世，由前任教宗接過了對話的接力棒，繼續與中國的對話之路。教宗給中國教會寫牧函和佘山聖母頌，關心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

當下的方濟各教宗與若望二十三世有驚人相似之處，不僅是因為在同一個高齡當選教宗，更是因其極具開明和創新的風格，他關懷窮人，與窮人為伍的精神，聞名於世。

方濟各從本篤教宗手中接過了對話的接力棒，積極推動與不同基督徒團體對話的進程，去瑞士參加了由天主教與信義宗共同舉辦的「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會議」，勇於直面教會在歷史上的問題，呼籲不同基督宗教以「悔改」和「修和」的精神，修補歷史上因雙方的過錯所造成的傷害。

教宗方濟各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多次表達如果時機成熟，他會去中國進行訪問。他認為，在對話之路上可能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只要一直敞開對話的大門，累積理解和信任，相向而行，中梵建交的偉大時刻應該不會很遠。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